

# 第一章 台语底层论

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解释语言分化的事实，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除了语言分化之外，语言融合、语言转用等情况也不断发生。因此，为了解释语言融合、语言转用等情况而提出的语言底层理论成了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相辅相成的理论。语言底层理论首由德国语言学家勃列斯多夫（J. H. Bredsdorff）在 19 世纪提出，后经意大利语言学家阿斯戈利等人的阐发，至今已经形成了应用广泛的理论。语言底层理论认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会发生语言转用的现象：有的语言是胜利者而流传下来，另一些语言成了失败者而消亡了。胜利者语言中所吸收的失败者语言的成分就是语言底层。失败者语言可以是当地居民的语言，也可以是外来者的语言。例如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3 世纪，罗马帝国占领了现在的法兰西后，民间拉丁语取代了当时高卢人说的凯尔特语，而凯尔特语则在法语中留下了一部分底层词，如 chemin（道路）、alouette（云雀）、mine（矿山）等。语言底层理论在研究民族关系复杂、语言变迁久远而复杂的亚洲语言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研究亚洲语言的系属分类中，特别是在研究亚洲语言中系属关系未明或有关结论争议巨大的语言中，语言底层理论的

解释作用是无可取代的。

底层理论传入我国较晚，但近年有几位语言学者用这一理论对中国语言作了成功的研究。欧阳觉亚（1991）认为他所讨论的汉台语关系词属于底层词。他指出：“而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则多表现在‘底层’方面，这和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被汉语同化有密切的关系。”“1980年我曾运用底层理论对粤方言和古越语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证实粤方言的确存在一个古越语底层的问题。”游汝杰（1982）认为：“汉语及其方言中的量词‘个、摆、稿、行、奇’等在汉语本身找不到来源，但是它们的语音面貌和使用范围却跟台语有关量词相似，这使我们不能不考虑它们可能来源于台语。”“汉语南方方言量词的语法作用跟台语十分接近，它们反映了台语语法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它们是残留在南方方言中的台语底层量词。”谢志民（1991）认为：“女书及当地传统土话中与壮侗语族语言有关的语词，应当是当地土著越人融合于汉族之后，在当地汉语中遗留下来的百越语言底层成分。”吴安其（1986）认为温州方言中有壮侗语底层（《民族语文》1986年第4期，观点与《汉藏语同源研究》不同）。赵加（1990）认为：“闽方言的一些词，基本上都是音无字，很难从汉语本身找到它们的来源，但却在壮侗语族语言中找到相应的词。因此有理由认为这些词是古越人语言被正在形成的闽方言吸收后所保留下来的，是壮侗语的底层词。”

在以上这些成功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拟就以下问题作新的探索：一，通过追踪现实语言底层形成过程来讨论台语底层形成的

机制、台语底层词的特征和判定标准等重要问题；二，通过全面考察《南宁平话词典》、《粤方言词典》、《尔雅》中的台语底层词来认识台语底层词在现代汉语（方言）和古代汉语典籍中的面貌；三，在此基础上讨论台语底层对汉台语关系的影响。

## 第一节 台语底层形成的机制

### 一、台语底层形成的基础

#### （一）从宏观上来说，语言底层形成的基础是“民族底层”的存在

“民族底层”是指某一地区由于民族之间的迁徙和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关系。“民族底层”是语言底层存在的基础，与台语底层有关的“民族底层”的问题，亦即南方地区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史实，欧阳觉亚（1991）作了较好的概述。这里引述如下：

自秦汉以后及至两宋，大批的北方汉人因避战乱而南迁，期间虽有过多次数战争，但都是规模较小，或者时间较短。如秦始皇于秦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派兵南下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五十万于五岭。汉武帝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因南越相吕嘉反，派兵击南越并设置九个郡。

在秦汉时代，南下的汉人在当地居于少数，加之在汉初建立的南越国王赵佗采取汉越互相融合的政策，自称“蛮夷大长”，带头“椎髻箕踞”，鼓励汉人与越人通婚。汉武帝置九郡之后，南下的汉人虽然略有增加，但与当地越人相比，还是居于少数。东晋以后，由于北方战乱，大量汉人不断南下，到了唐末和五代，汉人又出现南下的高潮。中古以后，北方的少数民族日渐强大，首先契丹统一了东北和北方广大地区，建立了政权，随后，女真又崛起于华北地区。在宋与辽、金对峙的三百余年当中，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进驻中原，与汉人杂居，另一方面中原大批汉人南下与南方的越人相处。到这个时候，汉族在全国各地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北方，契丹人和女真人基本上汉化了，汉族也增加了新的血液，吸收了许多契丹和女真文化。在南方，于越、闽越、东瓯等也逐渐融入汉人之中，而居于两广的骆越、俚僚，也自东而西地逐渐与汉人混合，只留下大量的古越语地名和各种文化遗迹了。……元代建立之后，民族的迁徙经常发生，大批蒙古军士和从阿拉伯、波斯东来的色目军士迁入中原各地，而又有大批汉人被强迫迁至漠北。回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到了元末明初在融入部分其他民族成分之后，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而散居各地的蒙古族多数融合到汉族或其他民族之中。到了明代，除了回族继续发展之外，南方各民族的关系渐趋稳定。……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是民族与民族特别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往史和融合史。

欧阳觉亚提到的“在南方，于越、闽越、东瓯等也逐渐融入汉人之中，而居于两广的骆越、俚僚，也自东而西地逐渐与汉人混合，只留下大量的古越语地名和各种文化遗迹了”这一论断十分符合壮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壮族地区来自壮语的地名相当普遍。在地图上看广西的地名，似乎与国内各地的地名无异：几乎都是两个汉字的地名。但稍一留意就会发现，广西地名中带“百”、“隆”、“坛”这几个字的比比皆是。带这几个字的地名常见于市名、县名、镇名、乡名，在农村中就更是随处可见了。当人们看到“百创（市名）、“隆安”（县名）、“坛洛”（镇名）这样的地名的时候，往往只是从字面上去理解它的含意，往往会觉得这些地名是“吉祥如意”之意（如隆安、百色、龙川），但这种理解却是与其原意风马牛不相及的。其实，带有“百”、“隆”、“坛”这几个字的地名都是来自壮语的，因而其含意与字面上的含意并不一致。

“百×”：“百”在广西的地名中也很常见，壮语的含义是“嘴巴”、“人口”，引申为“处所”。“百”即“×入口”或“×处”之意。例如百色市，乃广西名城，不少人将这个城市的名称望文生义地理解为“色彩缤纷”之意，这是误解。“色”在壮语中是“摔打拍洗”之意，“百色”即是“拍洗衣物之处”（百色市滨临右江，据考原是一拍洗衣物的口岸）。与此同类的地名有：百济（镇）、百包（乡）、百乐（乡）、百朋（乡）、百或（村）、百秘（村），等等。

“隆（龙）×”：“隆”（有的地方写作“龙”）在壮语中意为

“森林”或“草木丛生之处”。广西以“隆（龙）”为地名的地方也很多，均取意为“称作×的森林”或“×地之森林”。例如：隆安（县名），意为“称作‘安’的森林”。又如：隆林（县名），意为“称作‘林’的森林”。当然，这些被壮族先民称作“森林”的地方今天就不一定看得见森林了。与此同类的地名有：隆或（乡）、龙州（县）、龙茗（乡）、龙光（乡）、龙川（乡）、龙头（乡），等等。

“坛×”：“坛”在壮语中意为“水塘”。广西也有很多带“坛”的地名，取意为“某人的水塘”或“称作×的水塘”。例如：坛刘（村名），意即“刘氏之水塘”。又如：坛洛（镇名），意即“称作‘洛’的水塘”。这种取名方式来源于农耕社会。更多的例子如：坛学（村）、坛浮（村）、坛思（村）、坛榜（村）、坛拾（村）、坛白（村）、坛排（村）、坛板（村）。

带“百、隆、坛”等字的地名在广西地名中占很大比重，了解了这些来自壮语的地名的结构和取意方式，便可以较容易地理解那些很难理解的广西地名。事实上，这一类地名都可看作是台语的底层遗留。

关于南方地区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史实，还有不少学者作了类似的阐述。下面再引述若干：

自西汉武帝最后统一了南越和闽越之后，百越民族在历史上逐步消失了。这一地区的越人，除一部分被迁往江淮外，大部分则在汉族统治阶级入主百越地区之后，逐渐被汉族所同化，成为

当地汉族的一个重要来源，还有一部分则发展演变为现在的少数民族。现在分布在东南和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一般均认为它们的族源与古代越族有关。对此，学术上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佐证资料比较多的是属于壮侗语族的诸民族，如壮族、侗族、布依族、水族、毛南族以及海南岛的黎族和台湾的高山族等，此外如畲族、瑶族和傣族也认为与百越民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百越民族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置了四十一个郡，其中有十四个郡有越人分布，那就是在楚国领土上分置的十个郡与闽中郡、南方三郡。……在这段时间内，不仅中原北方人民大量迁入百越地区，而百越诸部之民也大量徙居内地。汉初惠、景之世，闽越与东瓯互相争战，据《史记·东越列传》载，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攻东瓯，东瓯告急于天子，武帝“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据《集解》引徐广曰：“年表曰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馀人来降，家庐江郡。”又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东越王余善反叛，武帝以兵征之，诛余善，招抚了其其他部落首领，给以封号，“于是天子曰：东越狭且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像这样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当不仅只是见于史书记载的这几件。……南方九郡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百越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百越

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内地人民向南方的迁徙移居，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南海、苍梧、合浦、九真、日南五郡，在西汉时共有人口 110593 户，554891 丁口。到了东汉，据《后汉书·地理志》记载，五郡人口为 270771 户，1114,444 丁口。三百年间，人口增加 1 倍以上，其中，与中原较近，又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区，人口增长数字特别大；反之，则人口增长数字就比较小。例如南海郡，西汉时人口有 19613 户，94253 丁口，到东汉时就增为 71479 户，250280 丁口，户数增加了 3 倍多，人口增加了将近 3 倍。又如合浦郡，西汉时人口有 15398 户，78980 丁口，东汉时增为 23,121 户，86,617 丁口，户数增加 50%，人口增加 10% 强。从两郡情形对比看——人口增长的数字相差很大，可以显然知道，自然繁殖不是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内地人民大量移入南方，才是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由于这样的关系，就必然会促使南方百越诸部，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必然发生很大变化，民族融合也就成为自然的趋势了。（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 [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以上概述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交往、迁徙、融合正是台语底层形成的基础。

## （二）语言转用现象的存在

语言底层形成的另一个基础是语言转用现象的存在。从本人

实地调查所得的情况来看，语言转用现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环境造成的语言转用。以广西邕宁县的情况为例。广西邕宁县地处广西南部。该地区民族的迁徙交融古已有之，而现在这里则是语言接触、语言转用频繁发生的前沿地带。本地有邕江的支流和上个世纪初修建的公路，还有历史更为久远的、本地话称为“车路”的古代驿道（班昭，1998）。当地本为壮族聚居地（有少量瑶族），后来操平话、白话的汉族人沿着江河、公路、驿道迁入（这个格局今天仍然依稀可见，汉族人主要居住于江河、公路、驿道两旁），形成了今天民族杂居的局面。在邕宁县，鸡犬相闻而语言各异的情况随处可见。这里有的村子甚至一半说汉语，另一半说壮语。在这样的语言环境里，语言转用经常发生（为便于交际，有时是处于自愿，有时是被逼无奈）。分散的语言转用个案很容易观察到，而且数量巨大，而集团的语言转用个案通过长期的追踪调查也能发现。我们在追踪调查中看到，一定数量的人群的语言转用是底层形成的直接原因。

其二是通婚造成的语言转用。在语言复杂的地区，通婚实际上常常是导致局部语言环境改变的直接原因之一，从而也是导致语言转用的直接原因之一。中国南方地区甚少有民族通婚禁忌，因而这一地区的不同民族和语言背景的人通婚非常普遍。而一旦这样的通婚成为事实，则其中一方发生语言转用便不可避免。在我们的实地调查中偶尔也发现某些不同民族和语言背景通婚的家庭存在各说各的语言的奇特的“双语状态”（他们都是双语者，故不妨碍理解），但这种状态非属典型，而且不会持续太久，因

为家庭内部磨合的结果通常是达致语言的统一。

### （三）大量双语者的存在

首先以壮族地区为例。壮族地区存在大量的双语者，这些双语者大致包含两部分人：壮族中的双语者（日常用语为壮语，在必要的场合可说汉语）；汉族中的双语者。目前，壮族中的双语者约占壮族总人口的69%（约1000万人）（班昭，1999）；汉族中的双语者则未有统计数据。不独壮族地区，中国境内西南地区的双语现象也是相当普遍的。众多双语者的长期存在为底层词的产生、底层现象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以下从“双语制对语言本身及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双语制量化分析”两方面较全面地说明相关情况：

#### 1. 双语制对语言本身及社会生活的影响

双语制（bilingualism）是世界上很多地区和民族共同的语言现象。英国语言学者哈特曼（R. R. K. Hartmann）和斯托克（F. C. Stork）两人合著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认为，典型的双语现象和双语制存在于瑞士、荷兰、威尔士这些地区。他们两人同时认为，个人或语言集团使用两种语言的现象就是双语制。根据这一定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现象也十分普遍，也属于典型的双语制。我国语言学者近年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现象做了很多研究，有不少有价值的论著问世。这些已发表的关于双语问题的论著基本上在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范围之内，即主要探讨双语制对社会生活、语言应用的各种影响。然而，双语制不仅

对社会生活、语言应用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它对相关语言本身，即这些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也都具有明显的影响。而双语制对语言本身的影响却是以往的研究所缺乏的。在此，笔者以壮族地区的双语制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一些新的材料，并侧重探讨双语制给壮语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和汉语（有关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 （1）壮族地区双语制及其量化分析。

就人口和民族分布格局而言，我国的汉族主要居住在城市、中原及沿海地区农村，而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边疆和部分内地农村地区。与此相关，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通行于边疆和农村地区，双语制即存在于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和一部分农村地区。以壮族地区为例，双语制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要点：

①一般县城以上城市通用汉语。这些城市中的部分壮族人在家中使用壮语。

②壮族聚居地区县城及更小的城镇通用壮语，但这些城镇的政府机构、学校、工厂、商业部门等则以汉语（普通话或某种汉语方言）为工作用语。如广西武鸣县、东兰县、上思县等属于这一类。

③壮族农村地区通用壮语，但在学校、乡、镇政府机构及商业部门则多使用汉语。

④杂居地区的县城及小城镇通用汉语，但也有部分壮族人平常在一些场合使用壮语。如广西邕宁县县城、横县县城、黎塘镇等属于这一类。

⑤一般情况下，壮族人在自己的家里和村子里，只需要掌握本民族的语言就可以满足交际的需要了。如果是在壮族聚居地区，则这种单一语言可以扩大到整个乡（仅仅是口语交际）。上面我们所说的通用汉语地区，当然不只是指那里的汉族人使用汉语，同时也指在那里进行交际活动的壮族（和其他民族）人。这样一来，使得很大一部分壮族人除了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交际之外，还必须在一定的场合使用汉语进行交际。

⑥在壮、汉杂居地区，乡村中的老百姓相当大一部分是双语者。比如邕宁县的乡村地区，人们从这个村子走到相距不远的另一个村子常常要交替着使用不同的语言——壮语和汉语。

从以上归纳的要点看来，壮族地区存在着很典型的双语制。而双语制的存在，是以一定数量的双语者（bilinguals）的存在为基础的。那么，作为壮族地区双语制的基础，壮族群众中到底有多少双语者呢？这是关于双语制的最重要的、最基本的量化分析数据。以往国内的双语问题研究基本上忽略了双语制的量化分析，以至我们甚少看到这方面的资料。有鉴于此，笔者将尝试对壮族地区双语制作基本的量化分析，以求出壮族群众中双语者的数量及其在人口中的比例：

①经过广泛的实地调查，加上笔者在壮族地区长时间的生活、工作和教学体验，可以确信，壮族群众中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含小学）都通汉语（普通话或某种汉语方言，下同），可以用汉语进行交际。在年轻人中尤其如此，而壮族群众中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者绝大多数是年轻人。这就是说，壮族群众中

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含小学）都是双语者。但这些双语者运用两种语言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比如有的人除运用壮语外，平时有很多机会和场合使用汉语（包括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而有的人平时使用汉语的机会和场合较少（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壮族人尤其如此）。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有关资料，壮族总人口为15555820人，其中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者为10757201人，占总人口的69.2%。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壮族人口中的69.2%共10757201人为双语者。这一量化结论已考虑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居住在县城以上城市的壮族人中已有部分人不通壮语，数量不详；

第二，县城及其以下城镇的壮族人仍使用壮语；

第三，乡村地区壮族人中的文盲和半文盲人群（即小学文化程度以下者）中有为数不少的双语者（虽未受过教育，但亦能说某种汉语方言），人数不详，但其数量肯定超过居住在城市而不通壮语的壮族人数。

因此，我们相信，以上关于壮族双语者人数的结论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的，甚至可以认为，这一数据是比较保守的。

②考虑到目前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平均达到98.4%，这个数据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高，这意味着壮族群众中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者逐步增加，因此我们认为，壮族双语者在人口中的比例将会逐步增加。

③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我国的文盲和半文盲（即小学以下文

文化程度者)中有9.68%是12岁至19岁的人群,其余的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分布在20岁以上的人群中。以我国较高寿命年龄90岁计算,70年后90%以上的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已基本离开人世,届时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者),只占总人口的2%左右。因此,70年以后(从1982年算起,因为以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为推算依据),壮族人中除了2%的文盲和半文盲以及占全族总人口28.34%的12岁以下儿童以外,都将是双语者。进一步推算可知,届时13岁以上的壮族人中将只有2.79%的人(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者)不通汉语,其余97.61%的人是兼通(或只通)汉语。当然,这一结论可以说是理论上的,它成立的主要条件是:

第一,壮族适龄儿童入学率稳定且逐步提高,最终接近百分之百,不再产生新的文盲和半文盲;

第二,现行的教育制度和语文政策基本不变;

第三,壮族人口结构无大变化。

事实上,在数十年内,上面三项条件都有可能发生某些变化。因而关于未来壮族双语者的推算结论只是理论上的数据和预测数据。但笔者认为,这个预测数据对于双语制的进一步研究及语文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2) 双语制对壮语的影响。

双语制能够给相关的语言带来明显的影响,使双语制下的相关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更加迅速和广泛。当然,语言间相互影响的因素有多种,如政治、文化、经济这些因素也能决定语言

间相互影响的进程，但是双语制的存在会使相关语言的相互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入。尤其是在某些没有文字的语言中，双语制的存在给这些语言带来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壮语就属于这样的语言。由于壮语原来没有通行的正式文字，后来创制的拼音文字应用范围也仍然很有限，而壮族人中有大量的双语者（如第一部分所分析的），因此壮语所发生的变化是相当明显和深刻的。壮族地区的双语制主要是壮语和汉语（还有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如瑶语、苗语、侗语等，其中有少数人成了多语者），壮语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汉语的影响而发生的。以往人们注意到了汉语对壮语产生的零星影响，并有了一些论述，但我们在这里所要阐述的是双语制下壮语语音、词汇、语法系统所发生的变化。

语音方面。在双语制下，一部分人经常交替使用两种语言——壮语和汉语，壮族人经常听到（其中的双语者则会说）另一种语言——汉语的语音，久而久之，汉语语音系统的某些要素就被吸收到壮语语音系统中来。吸收另外一种语言的某些要素通常有两个目的：一是从另一种语言中吸收某些本语言没有的要素“为我所用”，二是吸收双语制下的另一种语言的某些要素可以使两种相关语言的系统特点具有更多“共同点”，这反过来又有利于这种双语制的巩固和发展。壮语语音系统在双语制下吸收了汉语语音系统的某些特点和要素，继而使壮语语音系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王均等编著的《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指出：“除个别方言外，唇化舌根音声母 kw、yw 等几乎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中。近几十年来，在汉语的影响下，不同语言和方言增加了

不少腭化声母和唇化声母（或带介音的韵母）。”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双语制下壮语语音系统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壮语语音系统中送气音的出现。大家知道，壮语分北部、南部两大方言，其中北部方言（人口较多）没有送气音声母，南部方言则有送气音声母；同一语族的布依语送气音不发达，只出现于个别土语中；傣语（西傣）的送气音亦不发达，只是 p 与 ph、t 与 th 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而 k、kw、ts 等则没有相应的送气音，可见送气音在傣语中仍未发育完全；瑶族拉珈语有送气音，但只出现在单数调的词中，可见其发育亦未完全。从壮语本身及同语族的相关语音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壮语语音系统中的送气音声母，乃至壮侗语族各语言的送气音，都是受了汉语语音系统的影响而后起的（与壮语同一区域的苗瑶语族之勉语中的送气音只出现于汉语借词中；布努语中的送气音只出现在单数调中）。

词汇方面。壮语词汇系统受其他语言影响的现象早就被人们注意到了，比如众多的来自汉语的老借词、新借词已经被反复讨论过，此不赘述。在这里，我们想提供一个新的事实：在双语制下，壮语词汇系统所发生的变化相当明显而且正在加快。而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的某些词汇差异。请看下面这几个词，青年人和老年人采用了不同的说法：

汉语	老年人	青年人
小刀	mit <sup>8</sup> lek <sup>8</sup>	ɬai <sup>5</sup> ta : u <sup>1</sup> (细刀)
窗口	co : ŋ <sup>6</sup> kei <sup>5</sup>	ca : ŋ <sup>1</sup> ŋ. a : n <sup>4</sup> (窗眼)
画	we <sup>6</sup>	va : k <sup>8</sup> (画)

在以上这几个词中，老年人一般都使用本族语的固有词，而年轻一代则使用汉语借词。这样的差别是在两代人之间——几十年之间产生的，而这种现象与双语制有密切的关系——大量双语者的存在加快了语言间的相互渗透。

语法方面。在双语制下，壮语语法系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中最明显的是修饰语与中心词位置的变化。在壮语固有语法系统中，修饰成分在中心词之后，例如：

hyn<sup>2</sup> tau<sup>3</sup> hui<sup>1</sup>      来赶墟的人  
人      来      墟

修饰成分在中心词之后被认为是壮语语法与汉语语法的最大的差异，然而，现代壮语中已出现了不少修饰成分放在中心词前面的用例：